

章学诚、戴震方志理论之争的研究评述*

张易和

提 要:清代学者章学诚与戴震曾就方志纂修相关问题展开过一次激烈论争。关于论争的原因,晚清民国学者多从心理与学术思想角度进行分析,今人的分析则兼及二人现实境遇和时代背景等因素。关于章、戴学派划分的讨论,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者多将此次论争视作学派、学科之争,但这种观点遭到当今学术界的质疑。如何评判章、戴双方观点,早期学者倾向扬章抑戴,而近年来出现“为戴震正名”的趋势。

关键词:章学诚 戴震 方志 论争 研究评述

章学诚(1738—1801),清代著名史学家,乾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治学路径迥异于同代史家,纂修地方志的活动伴随一生。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提出诸多史学理论,都与修志实践有关。较章学诚稍早的学者戴震(1724—1777)精于考据学、义理之学,也曾参与史志编纂工作。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人曾相会于宁波道署,就地方志相关问题展开过一次激烈的论争,其过程在《文史通义·与戴东原论修志》中有所记述,其他篇目也间或提及。

戴震与章学诚有过多次接触,以其学界领袖地位,对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和治学路径产生了深远影响,向来为学界所关注。宁波道署的论争是两人较为激烈的一次思想交锋,且此时章学诚尚处于青年时期,文史理论尚未完全成熟,此次论争对其思想主张的塑造作用不可忽视。对此问题的研究,当成为解读章、戴关系和章学诚学术思想的重要一环。

晚清民国以降,涉及清代学术史,章学诚戴震研究的著作对这次论争大多有所分析。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我国新一轮地方志编修工作展开,学界出现一些专门研探这次论争的文章。此后,除了方志研究者,不少历史学者也陆续加入讨论,对前人观点加以辩驳,使研究愈趋热烈。相关研究与讨论一直持续到近年,分析也更加细致。本文拟对关于此次论争的研究论著进行综述,分类归纳各家观点,并结合章、戴二人部分著作略加分析评价,以总结前人成果,展望研究发展方向,促进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与研究。

一 关于论争原因的探讨

(一)晚清、民国学者及余英时的分析。不少晚清、民国学者倾向对论争背后章、戴二人的心理因素进行分析,以此解读论争的原因。最早论及该问题的当为晚清学者李慈铭。其《越缦堂日记》中略有对章学诚性格问题的批判:“而自信太过,喜用我法”“泛持一切高论,凭臆进退,矜己自封,好为立异”^①,并指出其性格缺陷引发一系列学术争端,其中就包括与戴震的修志之争。民国学者中,梁启超对此也有提及,认为章氏“嫉视当时考证之学,务与戴东原立异”^②。李得贤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章学诚的门户之见以及好胜心是争端的重要原因:“(章学诚)实则以浙东学派自居,而显有与考据家对峙之意。”“实斋既不满考据家之支离破碎,而心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方志所见文学文献整理研究”(项目编号:18ZDA258)阶段性成果。

① 李慈铭:《祥琴室日记》,《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2004年影印本,第6册,第4353—4354页。

② 梁启超:《〈龙游县志〉序》,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4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4335页。

尤好胜，故对当时学者之享盛名者……皆诋毁不遗余力。”^①因此，他致力文史，排斥考据，与戴震论志时多有不合。

郭斌龢则分析了戴震的心理，认为其“争心矜气，作崇其间”，或是因学术路径相异而心生反感；甚至可能“心知（章学诚）胜己，以示屏绝”^②。总之，戴震对章学诚的排斥心理，导致二人彼此相轻，不能平心探讨。这些心理分析固然有可取之处，但大多就事论事，基本没有涉及论争的深层次原因。李慈铭对章学诚的抨击未免过度，有丑化之嫌。

钱穆和余英时侧重从章、戴二人学术思想的角度阐释论争原因。钱、穆认为，两人“论道”与“言理”均有分歧。戴震始终主张“道在《六经》”，通过训诂来通经，由通经而明晰“圣人之义理”；章学诚则关注世道时运，注重创制，反对由《六经》求道，“盖一主稽古，一主通今，此实两氏议论之分歧点也”^③。宁波道署的论争中，戴震主张详沿革，章学诚主张重文献，即由此导致。余英时继承乃师观点，进一步分析章学诚学术思想形成过程。他指出，1766年章、戴首次会晤，戴震高度强调训诂，对章学诚造成很大冲击；此后，章学诚沉于史学，通过文献整理工作逐步探索自身文史理论，至此他“胸中已有一部《文史通义》”^④，并形成了两个重要认识，即经学与史学殊途同归，并无高下之分；治学之途也并不局限于考据一端，通过识解同样可求得“道”。这使他有足够的自信在修志之争中对戴震提出批判。

钱、余二人对章、戴学术思想分歧的论述可谓精当，余英时还探究了章学诚与戴震分歧的形成过程，相较钱穆笼统概述两人主张有所推进，充分反映戴震在章学诚的修志理论形成过程中的深远影响。但是，也有学者提出部分异议，如梁一群质疑章学诚通过文献整理形成自身理论的说法，“余先生此处推论，尚有欠妥之处，容易使人误解章氏学术思想的特点”^⑤，并指出余个别论据存在时间错位的谬误。

（二）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界的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学界长期对章戴之争关注不够。直到1998年，才有王卫平对此略加评论：“之所以形成这样激烈的论争局面，不能仅归因于个人性格，而是出于一种方志学者的责任感。”^⑥这仍显得较浅。实质性研究当在21世纪以来才全面展开，但进展迅速，在视角广泛与研究深入方面已超越前人，但也难免有不严谨之处。

孟旭琼主要从时代背景的角度分析论争原因。她指出，章、戴二人生活在考据学兴盛的乾嘉时期。戴震作为考据学派集大成者，“将实证主义精神运用于修撰地方志是历史的必然”^⑦。另外，戴震长期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发现因轻视沿革造成了大量错谬，因而对沿革问题十分重视。章学诚的理论则源于修志的实践，由此与戴震发生分歧。吴根友认为，章、戴分歧以致论争的原因当属思想价值、思维方式与方志理论的差异。二人对程朱理学态度不同，在伦理价值上存在深层次矛盾，以致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常流于情绪化。同时，他在钱穆、余英时的观点基础上指出，“（章学诚）所坚持的历史哲学思维方式与戴震所坚持的实证化的经学思维方式的的不同，使

① 李得贤：《章实斋与戴东原——戴赵水经注案辩证》，《学思》1943年第3卷第2期。

② 郭斌龢：《章实斋在清代学术史上之地位》，《国立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1946年第1期。

③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24页。

④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43页。

⑤ 梁一群：《章学诚与戴震之间学术思想影响述议》，《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⑥ 王卫平：《章学诚与方志评论》，《江苏地方志》1998年第3期。

⑦ 孟旭琼：《地理沿革在方志中的地位——论章、戴之争》，《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得他对道以及求道的方法的认识,与戴震不同”^①。另外,章、戴对地方志认识不同,戴震坚持地方志不同于正史,章学诚则以联系的观点看待二者关系。

孟庆斌、梅森更侧重于分析论争时章、戴的学术地位差异以及主观心理因素。孟庆斌指出,戴震此时学术地位如日中天,而章学诚则尚无为人称道的学术建树,希望得到戴震的认可从而确立自身的学界地位,却未能如愿,不免受到心理创伤,无法平心对待戴氏观点。他通过史学试图挑战主流的经学,以确立自身地位,导致同戴震的学术对立。梅森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指出戴震已经名满京师,学识得到认可;章学诚则在国子监和志局受到冷遇与排挤,不得赏识。这对于双方的气度和情感上也会产生一定影响。除此之外,两位学者还有其他创新之处。孟庆斌认为,章学诚以《皇言纪》对应国史中帝王本纪的编纂体例不合理,这是论争的直接原因;梅森则从经史关系的角度加以解读,提出这次论争是戴震的经学、考据学、厚古之学与章学诚“六经皆史”地方文献观在方志编纂方法方面的论争。^②王萌与梅森的观点相近,认为是两人不同的求道方法与经学、史学的相互竞争造成了论争。^③

综合上述学者观点,可以看到21世纪以来学界研究,在民国学者的基础上,更为关注时代背景和经学、史学的学科关系;对章、戴二人的主观因素也有所论及,较前人更为全面深入。但是,部分观点似乎也存在可商榷之处。例如,孟庆斌未免夸大了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他甚至认为“章学诚对戴氏的思想和学术体系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反击与清算”^④,但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似乎不合实际。一些学者指出,章学诚与戴震对于求取义理的根本追求是一致的,对戴震多有推崇。^⑤戴震去世后多年,章学诚在《书〈朱陆〉篇后》中尽管对其人品批评不少,却并不掩盖对其学术成就的认可,“戴君学问,深见古人大体,不愧一代巨儒”;“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⑥,这恐怕不能说是戴震思想和学术的“反击与清算”。关于《皇言纪》的问题,孟庆斌认为:“几条诏谕、封诰又怎么能充作志书的本纪,怎么能起到章氏所谓‘挈领而振衣、举纲而详目’的作用?章氏的修志理论当时还不成熟……所以只能生搬硬套,以不伦不类的《皇言纪》来填补志书本纪的缺位。”^⑦这似乎也可商榷。章学诚经历过修志实践,对孟庆斌提出的问题不应认识不到,因此即使他将《皇言纪》比附为正史的本纪,恐怕也只是形式上的比附,而非实质上的,不过是比附了其尊崇皇帝权威和中心地位的含义。可以说章学诚有以《皇言纪》为全书精神统领的意图,但这未必代表他要以其作为全书内容上的纲目。总之,某些程度过重的评价,恐怕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事实。

① 孟旭琼:《地理沿革在方志中的地位——论章、戴之争》,《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② 参见孟庆斌:《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2期;梅森:《方志性质之争抑或编纂方法之论——戴震与章学诚宁波道署论争辨析与方志学派存在与否之质疑》,《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9期。

③ 参见王萌:《章学诚笔下的戴震形象》,《理论月刊》2014年第10期。

④ 孟庆斌:《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2期。

⑤ 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第14页提及“实斋这次与东原论学最契合的地方,同时也是实斋最心折于东原之所在,是东原关于义理方面的见解”;王萌在《章学诚笔下的戴震形象》一文中也认为,“真正与戴震同道,为其知音的还是章学诚。……此后他亦多次称道戴震的学术”。

⑥ 参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卷3《内篇三·书〈朱陆〉篇后》,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32页。

⑦ 孟庆斌:《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2期。

二 关于章、戴学派划分的讨论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学界对方志性质争论的展开,部分学者倾向于将章学诚、戴震划为截然对立的两派,由此将章戴论争上升到学科之争的高度。与之相对,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将其仅视为编纂方法的论争。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学派论争”的说法提出批判,从史料解读和学科定性两方面提出新论据,指出章、戴二人修志主张相互包含与重合之处,体现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一) 20世纪80年代初的“学派论争”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些学者在探讨章戴修志之争时,鲜明地提出这次争论为“学派论争”“学科论争”的观点,至今仍有影响。关于具体的派别划定,又多有不同,如史念海的史志之争说、刘光禄的历史派与地理派之争说、王嘉炜的考据派与文献派之争说等。

1982年,史念海在《论方志中的史与志的关系》一文中提出,“方志中关于史与志的争论是一个老问题……其间争论较为突出的,应该数到清代乾嘉时期的戴震和章学诚两家”^①。戴震主张方志纂修当以地理为重,“侈言文献”;章学诚则主张志属信史,地理沿革不过聊备一格,这是“将史的作用属诸地方志”。由此将章、戴论争划为史、志学科之争。

此后不久,刘光禄提出地理派与历史派的划分,引发的争论最为激烈。他指出:“从对方志性质的认识看,可以分为地理派和历史派……这两种观点清代曾引起章学诚和戴东原等人的争论。”^②地理派认为方志是地理书,应当注重地理方面的内容;历史派则认为方志是历史书,应注意历史文献、人物等方面。不少学者同样持这种观点,如柳维本、林衍经、来新夏等。^③直到近年,马春晖在论文中仍提及“清代志家辈出,形成志学的两大主流学派。即以戴震主要代表的地理学派和以章学诚为主要代表的历史学派”^④。

另外,林衍经还将戴震、洪亮吉、孙星衍等人划为考据学派,认为其信条是把地方志看作是地理沿革的考证^⑤,章学诚以重视文献的理论挑战戴震,即是两个方志流派争端的缩影。王嘉炜也提及章戴“二人在方志是地理属性还是史学属性的问题上分歧很大”^⑥,同时认为这种分歧实质是考据派和文献派的论争。

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学者虽将章、戴按学科划入不同派别,但相对全面地分析了二人主张。张景孔提出章学诚重著述亦不轻纂辑、戴震重地理而非唯“地理沿革”,他们论争的焦点是方志的史地属性问题。^⑦黄苇也认为,“按纂修人观点分,方志编修还可分为历史、地理、实用三

① 史念海:《论方志中的史与志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

② 刘光禄:《历史上方志的派别、类型和修志主张》,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编:《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中华书局,1981年,第308页。

③ 参见柳维本:《章学诚与方志学》,地方史志研究组编:《中国地方志论集》,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3年,第211页;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方志通鉴》,方志出版社,2010年,第1621页;来新夏:《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2期。

④ 马春晖:《试析戴、章学派之争下的方志文艺志走向》,《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3年第8期。

⑤ 参见林衍经:《方志史话》,中州书画社,1983年,第55—57页。

⑥ 王嘉炜:《章学诚与安徽〈和州志〉——兼对章、戴论辩的学术梳理》,《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⑦ 参见张景孔:《对章、戴论争的再认识》,《黑龙江史志》1995年第6期。

派”^①。章学诚为历史派代表人物之一，戴震则属于地理派。但黄苇也注意到了“地理派志书内容……宋后无所不在，几与历史派志书无异”^②。

以史、地等学科、学派划分两人主张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未免以偏概全，特别是有遗漏戴震一些重要主张的风险。这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单纯研究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一文，而忽视了戴震本人著作所致。史念海认为章学诚文中相关内容“虽然转述，与戴氏的思想当无所差距”^③。对章氏此文加以研究，恐怕未必如史念海所说。章氏记载有较强的偏向性，恐怕只保留了对自己有利的论辩内容——文中仅涉及戴震的两个观点，即“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以及相当荒谬的“取名僧事实，归之古迹”^④，均被章学诚驳得体无完肤。这场论辩分两日进行，不可能只讲了这些内容。戴震同为方志名家，恐怕能拿来论辩的理论也远不止文中所记的两点，可见章学诚的记载有所删减。除删减外，似乎还有失实。章氏转述戴震言“然修志不贵古雅。余撰汾州诸志，皆从世俗，绝不异人”^⑤，而戴震《乾隆汾阳府志例言》中却言“各州县志多有所谓八景、十景，漫列卷端，最为鄙陋，悉汰之以还雅”^⑥，既破除了旧志的弊病，没有“从世俗”，又非常注重“还雅”，与章学诚的说法截然相反。《中国方志通鉴》在对《汾州府志》的评价中也称，“是志义例精严，文辞雅训，考据精审”^⑦。至于所谓“名僧归古迹”的说法，亦未必十分可靠（下文详述）。由此，恐怕不能仅依靠章氏一家之言分析戴震的修志理论。并且，以历史派、地理派这样的现代学科概念对古代学者加以划分，是否合适，也有学者提出质疑。

（二）对“学派论争”说的批判。针对学派论争说的弊病，一些学者相应提出了批判。葛剑雄较早从学科性质的角度进行批评。他指出，古人所谓“地理”与现代地理学概念并不一致，始终不是独立学科，而只是作为历史学的分支与辅助。“章学诚的观点的实质只是强调了方志在历史学中的地位，而不是改变了方志的属性。”^⑧进而，章氏与他人的分歧当属体例门类之争、方志在历史类中地位轻重之争，而非方志性质之争。葛剑雄的论证清晰有力，他对传统与现代意义上“地理”概念的差别作了科学区分，质疑以现代概念为章、戴划分学派的观点。

孟庆斌同样从学科定性角度展开论证。他认为，争论的焦点是以何者为志书之纲的问题，而非学派之争。“至于‘地理’与‘史’，章、戴二人谁也没有明确这是两个对立的观念。”^⑨从学术背景看，章、戴提及的“历史”与“地理”不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其中“史”包括天文、地理的内容；“地理书”也是包括了人物和社会情况。这种观点与葛剑雄遥相呼应。但孟庆斌又进一步认为，“这种‘地理书’就是方志，与章氏的‘一方之全史’实同名异，更不存在对立”^⑩。这似乎就值得商榷了。地方志与地方史尽管内容上存在重合，恐怕也不能完全画上等号。

① 黄苇等著：《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57页。

② 黄苇等著：《方志学》，第367页。

③ 史念海：《论方志中的史与志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

④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卷8《外篇三·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第885—886页。

⑤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卷8《外篇三·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第885页。

⑥ 戴震：《乾隆汾州府志例言》，戴震研究会等编纂：《戴震全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册，第491页。

⑦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方志通鉴》，第97页。

⑧ 葛剑雄：《编纂地方志应当重视地理》，《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5期。

⑨ 孟庆斌：《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2期。

⑩ 孟庆斌：《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2期。

谭其骧就指出，地方史以记叙过去为主，地方志以现状为主，同时追溯一下过去，二者侧重不同。史记述人类活动、社会现象；志则自然社会并重，分门别类记载地形、气候、水文、地质、矿产、动植物等内容。^①

黄燕生则从史料解读的角度提出批驳。他注意到章学诚对戴震的记述有所失实，根据戴震的《乾隆汾州府志例言》，指出戴震并非只讲沿革，别无卓见，相反有不少关于修志要旨和方法的具体意见，如删汰州县胜景、详载水利水患等。^②

梅森从史料和学科属性两方面均展开了激烈批判，甚至已超出章、戴论争本身，上升到后世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态度层面。他认为：“我们似乎很难得出所谓的方志性质之争和所谓的方志学地理学派与历史学派的概念；看到的仅仅是方法论范畴的编纂方法之争。”^③ 后世学者不应根据章学诚后来的修志成就将其划为历史派，更不应单纯依据章学诚的记载随意划分学派。为论证这一点，他对戴震《汾州府志》和章学诚《永清县志》的内容进行分析，指出前者并非仅谈沿革不重文献，而是将农政水利、官事民事分类记录，也强调民之利病的记述，且如果不依靠地方文献，这部著作根本不可能完成；《永清县志》也有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记述。他甚至指出，将此次论争称为方志性质之争或史、地属性之争的理论，“其实是做学问的功利心理起作用：学问要有体系，以致妄贴标签”^④。梅森超越前人之处在于他对章、戴理论分析更为全面，特别是通过《汾州府志》分析戴震修志理论的做法，无疑比章学诚的转述更为可靠。但他对学派划分说学者的动机做出的负面评价，笔者则不敢苟同。

另外，笔者认为，对于反驳将章学诚划入纯粹历史派的观点，似乎还可补充两条材料：从具体修志理论上，章学诚在与戴震论辩前写成的《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中，详细论述地方志中地理沿革的相关内容。如“至坛庙碑铭、城堤纪述、利弊论著、土物题咏，则附入物产、田赋、风俗、地理诸考，以见得失之由，沿革之故”^⑤，明确提及收录人文地理诸方面记载，以彰显沿革，且志中专门有“地理考”；“如星野、疆域、沿革、山川、物产，俱‘地理志’中事也”^⑥，更进一步讲解地理志应包含的内容，其中就有沿革一项。可见，戴震强调的地理沿革考证也并不为章学诚所忽视，二人修志理论共通之处不少，将其视作截然对立显然有失全面。

三 学界对论争中章、戴观点的评价

学界对于修志论争中章、戴双方观点的评价存在明显的转变。民国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内学者，大多倾向于扬章抑戴，或是站在现代方志理论上对二者均加以批判，恐怕有以今论古的问题。随着近年来研究深入，特别是对双方理论分析更为全面，研究者大多开始置身历史背景，细致分析两种理论的价值和不足，并且出现了明显的“为戴震正名”的潮流。当然，我们

① 参见谭其骧：《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中国地方史志论丛》，第8—10页。

② 参见黄燕生：《清代的方志学》，《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

③ 梅森：《方志性质之争抑或编纂方法之论——戴震与章学诚宁波道署论争辨析与方志学派存在与否之质疑》，《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9期。

④ 梅森：《方志性质之争抑或编纂方法之论——戴震与章学诚宁波道署论争辨析与方志学派存在与否之质疑》，《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9期。

⑤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卷8《外篇三·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第841页。

⑥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卷8《外篇三·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第846页。

也应看到,在对既往结论进行纠偏时,似乎出现了一些矫枉过正的问题。

(一) 较早时期学者的评判。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学者对于此次论争的评判,几乎全部偏向章学诚一方,或是对戴震加以批驳。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书中述及章、戴之争。他认为,方志属史,因而章学诚力驳戴震将方志视为地理专书的观点无疑值得推许:“直至章氏,始辨析方志与图经之别……此可谓创通大义前无古人者矣。”^①张其昀对比章、戴二人的修志主张,指出章氏以史法修志,“详略去取,精于条例;政教典故,备于平日”^②,通过完善对记载内容的筛选,极大便利了后世修史工作。傅振伦对章学诚记载戴震“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的观点痛加批驳,基本沿用了章学诚的观点,认为方志属于地方史,“时殊势异,旧志不能尽赅,是以多则百年,少则三十年,须更修也”^③;地理沿革并非主要内容,也无需专门考订。寿鹏飞针对上述观点也指出,过度轻视文献,“仅详地理,不及民生”^④,将无法发挥方志应有的作用。当然,也有学者持较为调和的观点,如李得贤认为章、戴二人“其间并无优劣轩轻之分,特其治学途径不同,故所务亦各异其趣”^⑤。唯晚清学者李慈铭,或许因所处时代较早的缘故,较为与众不同,站在批判章学诚的立场上,抨击其主张为谬论。^⑥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界倾向于扬章抑戴的学者,当以仓修良最有代表性。他在《论章学诚的方志学》一文中提到,“就此争论而言,两者相较,章学诚的主张显然比戴震高上一筹”^⑦,因为戴震的主张会将专务考索、轻视文献、不问政治等不良学风带到修志领域,章学诚的主张则是本着经世致用的观点。他在《章学诚评传》以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的注解中,都重申了上述赞扬章学诚的观点,还批评戴震“将名僧归之古迹”^⑧。针对谭其骧对章学诚主张“迂阔”的批评,他为章学诚辩护,认为“志属信史”是针对将方志视为地理专书的时代背景专门提出的,不能认为就是迂阔之谈。^⑨

来新夏观点与仓修良近似,他褒扬章学诚根据实践经验,注重文献资料积累,“由单纯的地方史发展为包容各种情况的地方志”^⑩;提出“志属信史”,辨明了方志应有地位,且对方志内容体例做出重要革新。^⑪同时,他批评戴震泥于古体、“专务考据,不多追求新文献,信载籍而对反映现实的资料不够重视”^⑫。

朱士嘉也明确认为论辩中“章氏的主张是正确的”^⑬。他指出,地方文献如不及时进行搜罗,将有遗失湮没的危险,因此章学诚重视地方文献的主张是可取的。此外,李昭恂、柳维本、

①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19页。

② 张其昀:《刘知幾与章实斋之史学》,《学衡》1922年第5期。

③ 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6—37页。

④ 寿鹏飞:《方志本义管窥》,《国学丛刊》1941年第14期。

⑤ 李得贤:《章实斋与戴东原——戴赵水经注案辩诬》,《学思》1943年第3卷第2期。

⑥ 参见李慈铭:《祥琴室日记》,《越缦堂日记》,第6册,第4355页。

⑦ 仓修良:《章实斋评戴东原——章学诚史学研究之二》,《开封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⑧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卷8《外篇三·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的注解,第887页。

⑨ 参见仓修良:《论章学诚的方志学》,《中国地方史志论丛》,第330页。

⑩ 来新夏:《略论地方志的研究状况与趋势》,《中国地方史志论丛》,第360页。

⑪ 参见来新夏:《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2期。

⑫ 来新夏:《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2期。

⑬ 朱士嘉编著:《中国旧志名家论选》,《史志文萃》编辑部,1986年,第36页。

林衍经等学者均对论争中章学诚志属信史、重视文献等修志主张给予高度赞扬。^①

史念海对章戴双方均加以批评，相比之下对戴震的评价更为负面。他认为，戴震受到考据风气影响，“把方志的志仅限于沿革”，显得“相当狭隘”^②。“只注意于沿革，就谓已经尽记载前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事，是极不恰当的，可说是‘一叶障目’。”同时指出，章学诚认为方志为地理图经所舛讹、方志为一方全史，完全失去志的意义，也有所偏颇。^③

以上学者的观点，提出时间大多较早，疏漏难免。他们批判戴震的重要理由之一，是他将方志视为纯粹的地理类书籍、除地理沿革外别无所重。这一说法，基本仅来源于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一文。前文已分析过，该文记载称不上客观，更未能全面反映戴震的主张，梅森、黄燕生、张景孔等学者也已对章学诚的记载进行过驳正。另外，一些学者（如仓修良）批判的戴震在《汾州府志》中将“名僧”归入“古迹”一事，恐非信史。《汾州府志》刻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恰在章、戴论争前，相距不远。查其《例言》，并未提及要将名僧归入古迹；关于对寺观的记录，却有“古迹、冢墓、祠庙、事考四者，备稽古者之检之也；……寺观附祠庙之下，明非正也”^④一句，明确指出，寺观是附于“祠庙”而非“古迹”条目下的。对照章学诚转引的戴震说法，“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当归古迹，故取名僧事实，归之古迹”，^⑤称“古寺当归古迹”，显然与《汾州府志·例言》不合。笔者遍检《汾州府志·古迹》，也未见任何僧人事迹^⑥；祠庙条目下，确有个别寺庙记载中包含其中修行过的名僧，但僧人事迹附属于所在寺庙之下，而非与寺庙并列，应当并无将名僧视同寺庙之意。^⑦章学诚转述戴震话中却包含“然僧岂可以为人？他志编次人物之中无识甚矣”^⑧等语，似乎有杜撰成分。总之，应当可以判定，仅根据章学诚说法对戴震进行批判是失当的。这似乎可归因于对史料的掌握、分析不够周全。另外，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如金毓黻等，因其秉持方志属于地方史的观点，而章学诚主张“志属信史”，故对其相当推崇。今日看来，恐怕也不够全面，因为多数学者已经达成统一，认为地方志除了本地历史外，还需要包含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现状等方面内容。^⑨至于改革开放初期学者，或许受到革命史观的影响，褒扬章学诚对方志体裁提出创新，冲击了旧有的、占据学界权威的体例，而并未客观分析其新体例的优劣，因而也难免有失严谨。

（二）近年来学界的观点转折。20世纪80年代初已有学者为戴震辩护，如陈光贻提出方志中分辨沿革最难，而戴震正精于此，称赞其为“通儒大师”，并驳斥章学诚所谓戴震“不解史学”之说，认为“考证古地理，而与治经、史何分，学诚‘六经皆史’之说，岂自相矛盾”^⑩。

① 参见李昭恂：《章学诚在方志学上的贡献》，地方史志研究组编：《中国地方志总论》，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1年，第201页；柳维本：《章学诚与方志学》，地方史志研究组编：《中国地方志论集》，第211—212页；林衍经：《方志史话》，第55—57页。

② 史念海：《论方志中的史与志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

③ 史念海：《论方志中的史与志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5期。

④ 戴震：《乾隆汾州府志例言》，戴震研究会等编纂：《戴震全集》，第1册，第491页。

⑤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卷8《外篇三·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第886页。

⑥ 参见戴震纂，孙和相修：《汾州府志》卷23《古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558—565页。

⑦ 参见戴震纂，孙和相修：《汾州府志》卷24《祠庙》，第573—586页。

⑧ 章学诚著，仓修良编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卷8《外篇三·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第886页。

⑨ 参见程方勇：《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志性质研究概述》，《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3期。

⑩ 陈光贻：《戴震之“志以考地理”》，《文献》1981年第4期。

但解释过于简略,也仅限于考证地理沿革的意义,并未引用新材料、深入分析戴震的修志思想,说服力还是有限的。对章、戴二人理论的评判发生真正改变,并出现“为戴震正名”潮流,应当还是在90年代以后。

1991年起,多位学者对此前受到忽视的戴震《汾州府志》重点分析,从不同角度论证其价值,并对章学诚主张的方志体例提出一定批评。黄燕生指出应当重新评估章学诚的方志地位,批评其“三书四体”的方志结构并不合理,过度追求复古导致“不免于诸考之外复录六书,事文之后缀拾艺文,负叠床架屋之累”;一味尊王,也脱离了郡县实情。同时认为,戴震重视地理沿革是针对旧志弊病提出的,这是修志的难点,提请后人慎重对待无可非议,戴震也并非仅重视沿革。^①张景孔同样注意到不少学者对章学诚记载的异议,指出戴震“决不是主张方志中全然不载非地理方面的内容”。他引用《汾州府志》例言,指出其在方志史上多有好评,由此认定戴震在地理沿革之外还是多有识见的。^②孟旭琼认为,利用戴震对地理沿革的考证方法,核实记载的真实性,才能确保志书的科学性、学术性;相对而言,章学诚“一味地摒弃对地理沿革的考证而重视历史文献的记载实属无本之源”^③。孟庆斌则根据章学诚以《皇言纪》比附本纪缺乏可行性的观点,对章学诚从修志理论到个人性格均加以批判,而认为戴震的志书体例“实际出于戴氏治学的切身感受”^④。梅森除了论证戴震的志书在地理沿革外还记载了大量其他内容,更进一步指出章学诚转述戴震主张的失实之处:“章学诚为强调文献的重要,实际上偷换了戴震的概念,戴震并没有说修志只修地理沿革即可。”^⑤

美国学者倪德卫则着眼于章学诚对文献和方志现实意义的重视,提出新说。他认为,章戴论辩体现出章学诚的信仰,即“当代对于历史研究者的重要性”,同时也批评道:“这一论辩也展示出一种显见的复杂性上的缺陷,它没有给我们提供为什么历史要被重写而非简单延续下去的理由。”^⑥可以说是从另一视角对上述批评章学诚观点的补充。

除批评章学诚、为戴震正名的学者外,也有学者持中立的态度,如吴根友认为戴震将地理沿革放在首位只是自身特色,并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章学诚更加注重地方志与国史的联系,由此,“我们不能说孰是孰非,而只能说二者各有所长”^⑦。王嘉炜则认为,戴震沿用传统模式,符合考据学家的态度;章学诚则开创了新的方志体例,并称赞其“在戴震面前十分鲜明的学术态度,直白的表述没有给一代学术大师戴震丝毫当场反驳的余地”^⑧。

可以说,上述学者基本跳出了挑战权威、史学革新等传统分析视角,就事论事地对章、戴二人观点展开评述,对前人不乏批判。他们在研究方法上最大的进展当属更多关注戴震本人的著作,从中直接提炼其修志主张,从而发现章学诚记载失实之处。这是对一手史料的有效运用,体现出历史研究者应有的对材料谨慎全面分析的态度。对于章学诚的批评,很多也不无道理,纠正

① 参见黄燕生:《清代的方志学》,《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

② 参见张景孔:《对章、戴论争的再认识》,《黑龙江史志》1995年第6期。

③ 孟旭琼:《地理沿革在方志中的地位——论章、戴之争》,《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④ 孟庆斌:《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2期。

⑤ 梅森:《方志性质之争抑或编纂方法之论——戴震与章学诚宁波道署论争辨析与方志学派存在与否之质疑》,《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9期。

⑥ [美]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页。

⑦ 吴根友:《重评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⑧ 王嘉炜:《章学诚与安徽〈和州志〉——兼对章、戴论辩的学术梳理》,《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了前人论述中的偏颇。但也不应忽视，如上文所述，某些学者对章学诚批判略显过激，甚至上升到对其性格缺陷的攻击，似属矫枉过正。

余 论

对于章学诚、戴震修志之争研究的发端，既由学术史大背景决定，更有国内学界小气候变化的影响因素。章、戴二人在清代学术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可谓是乾嘉时期经学与史学的代表人物。凡涉及近三百年学术史研究，必定会涉及章、戴二人；而他们之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方志问题的论争几乎是探讨二人关系和方志理论时绕不开的话题。这是民国以来各家对此探讨不断的原因。同时，应当认识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于此问题关注明显增加，引发对章戴之争的研究走向新阶段，这与我国新一轮地方志编纂工作展开、学者对方志理论以及历史上方志学家的主张更为关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程方勇即指出，20世纪80年代初随方志研究的复苏，“此时推动方志理论研究的主要是老一代方志学者，他们对方志理论的整理也主要表现为对传统方志理论的总结”^①。由此，章戴论争自然得到高度关注。特殊的时代背景，决定此后相关研究的若干特点和走向。

梳理对章戴修志之争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民国时期学者对该问题的分析尚比较有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相关研究升温，并呈现明显阶段分异。早期的论著，带有强烈致用色彩，即意图通过对章戴之争的探讨和评论，对我国新方志编纂提供借鉴与指导，由此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史学研究的求真要求。程方勇分析，这一阶段老方志学者研究重点在方志的属性确定，及其与邻近学科的关系界定。从《中国地方史志论丛》收录的论文看，也确实有大量文章在争论“社会主义新方志”应当偏重历史学科还是地理学科、史与志的关系究竟如何。由此便不难理解此时不少学者，特别是参与方志理论研讨的学者，较少关注章、戴论争的起因，而热衷于讨论其实质，并将论争双方划为截然对立的历史派与地理派了。然而这种简单划分毕竟有违背史实、忽略重要史料的问题，引来此后学者的质疑。特别是近年来，由于方志理论的研讨已经相对淡化，甚至“几乎已经演变成方志圈里的‘内争’”^②，更多学者转向从纯粹历史研究的角度分析章戴论争，研究的求真目标愈发彰显，而致用色彩有所淡化，因而呈现出对史料运用更全面、分析更客观的特征，推动研究不断进步。

历经多年研究与争论，有关章戴之争的很多问题已基本可以定论，但也有一些仍存争议之处。关于此次论争的原因，钱穆、余英时从思想史角度提出的二人对求道方式的认识不同，进而导致治学路径不同，这种说法基本得到了学界公认。国内学者的其他主张，如学术背景，即占据主流地位的经学与新兴的史学发生竞争；两人不同价值取向和境遇导致主观情绪上产生影响等，基本也形成了共识。还有一些学者主张，章学诚在论争中有意攻击戴震重视考据的治学方法，以便自立门户。对于论争的实质和学科划分，根据近年来学者提出的大量论据，应当可以断言，所谓“学派划分说”并不能成立，以历史派、地理派形容章学诚与戴震是不妥的，前者并不轻视地理沿革，后者也并未局限于此；当时“地理”一词包含更广泛的含义。因此，不能认为论争的实质是历史、地理或史与志两个学派的争辩，视为单纯的方志编纂方法之争似更为妥当。关于对章、戴主张的评价，早期学者对戴震的一味抨击已为后人不取，应当承认戴震的修志理论也有

^① 程方勇：《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志性质研究概述》，《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3期。

^② 程方勇：《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志性质研究概述》，《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3期。

一定合理性，其成果同样值得肯定。但是，对于章学诚的主张应当作何评价，似乎学界仍未有定论，有学者认为将《皇言纪》置于篇首危害严重，也有学者批评其“三书四体”的主张并不实用，但都是一家之言，尚待探讨。

笔者认为，除了上述未定论之处应继续探讨外，对这场论争的研究还可进一步深入。从史料解读的角度看，涉及论争过程和双方主张的《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乾隆汾州府志例言》等，似乎尚缺少全面深入的文本分析。不少学者对此有所引用，却都是只言片语，并不全面，甚至可能出现断章取义。因此，根据全文进行细致解读，可能有助于系统厘清双方主张，进而更全面地认识他们的共识和分歧，以免出现评价偏颇；或许还可以章、戴两文相互参照，弥补章学诚文中记载的失实、删减的弊端，更大限度上还原论争的历史真相，并推测章学诚加以删改的原因，进一步揭示他对于这场论争以至对戴震本人的某些隐秘心理。另外，从论争意义来看，这次论争对章学诚产生的影响，目前研究尚不够充分。仅孟庆斌提出，这场论争使章学诚修志时由以《皇言纪》为纲转向以大事记为纲^①，其他学者似较少有相关论述。当然，这似乎是相对困难的，恐怕需要对章、戴二人相关著作透彻研读，从中搜寻隐含的、零散的史料，并全面把握二人学术思想，并非一日之功。目前看来，随着章、戴论争相关研究的快速推进，学界对二人修志思想、方志理论的认识已大为深化，这既促进了清代学术史研究，更折射出我国史学界、方志学界的发展进程。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本文责编：周全

民国《榆次县志》影印本出版发行

2019年7月，晋中市榆次区史志研究室组织整理的民国《榆次县志》影印本由三晋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志由常麟书、常赞春前后担任总纂，共20卷，上起上古、下至民国26年（1937），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考，有方域、城市、乡聚、交通、赋税、生计、水利、教育、宗教、礼俗、官师、选举、艺文、旧闻等14卷，下编为录，有名宦、仕实、文儒、卓行、艺术、贤媛等6卷。卷首有图、本志序及前志序多篇，卷末附后序、跋及修志始末。

影印本是以国家图书馆民国31年（1942）铅印本为底本整理影印，共计一函9册20卷，约50万字，卷帙分合，一仍其旧，纸材装帧，承袭古风，为史志文化界提供一部集研究、学习、欣赏、收藏、传承为一体之志书精品。

此前，由卢海亮点校的《榆次县志》点校本已于2017年由三晋出版社出版发行。

(晋中市榆次区史志研究室)

^① 参见孟庆斌：《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2期。